

道與政之間——

周秦漢之際的孔子論述



吳曉昀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典範集成·思想5

道與政之間—— 周秦漢之際的孔子論述

吳曉昫 著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著作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新文豐出版公司

目次

林序	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論題視野——從真相到定位的孔子論述研究	2
第二節 問題意識——周秦漢之際的孔子定位問題	7
第三節 既有研究成果述評	16
第四節 研究設計相關說明	38
第二章 戰國孔子論述的形成	
——並論孔子論述研究的基本面向	49
第一節 戰國語境中的「孔子」所指	
——符號意義的衍生	50
第二節 「孔子」與「聖」的連結	
——概念交涉與議題形成	89
第三節 戰國孔子論述的詮釋活動特質	
——言說行動的時代意義	124
第三章 「孔子」的身分	
——戰國孔子論述中的學政關係問題	155
第一節 議政身分的兩種界說	157

第二節	君臣關係中的位階爭議	187
第三節	戰國學者的身分認同	223
第四章	尊「孔」的意義	
——	秦至西漢中期的孔子論述重構	255
第一節	問題意識的轉換	258
第二節	「孔子」意義的改造	292
第三節	「孔子」位階的抬昇	348
第五章	皇權的回音	
——	西漢中晚期孔子論述的道、政調處	393
第一節	武昭宣年間官方論述的回應	395
第二節	宣元成年間儒者論述的調整	444
第三節	主體間性的西漢孔子論述	480
第六章	結論	517
參考書目		529
後記		565
索引		567

第一章

緒論

孔子形象、地位的紛雜、變化，是周秦漢思想史的特殊現象。人們持續追問孔子的「真面目」，卻是治絲益棼、人言言殊。顧頡剛曾簡要提挈：「春秋時的孔子是君子，戰國的孔子是聖人，而西漢時的孔子是教主，東漢後的孔子又成了聖人」。¹如此周折起落，竟仍未盡芸芸眾說。一般認為，當時美醜、尊卑不一的「孔子」，是出於諸子主觀的好惡。然而，周秦漢之際是一個既有秩序全面轉型的時代，人們面對為現實世界尋找、調整理想秩序的挑戰。值此百廢待舉之際，為甚麼評述孔子的言行事跡、塑造孔子的形象、地位，會特別成為眾人參與的熱門話題？

本書將指出：在西漢儒者尊孔前後的「孔子論述」，如何牽動當時道、政關係的討論與發展。此間論議，外則以塑造孔子形象、地位的方式呈顯，內則蘊含論者對政治、社會秩序轉型的不同觀點。而周秦漢之際的孔子論述，就在各家學說與現實發展的多方互動中不斷開展，既受時代影響，也轉而影響時代。而在展開討論之前，本章將先說明「孔子論述研究」作為一研究主題的基本關切、本書的問題意識、學

¹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收入顧頡剛：《古史辨》第2冊（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139。

界相關研究的主要角度與成果、以及本書在研究範圍、方法、結構上的安排。

第一節 論題視野 ——從真相到定位的孔子論述研究

分析既有的孔子論述，不是晚近才出現的思考。如果將孔子論述研究寬鬆地理解為：評析某種傳達出孔子形象、地位的言說著述，則這種後設的目光，其實早在戰國時代就已經相隨孔子論述出現。從《墨子》譏刺孔子欺世盜名、《韓非子》批評孔門後學人人自謂真孔子開始²，這類因探問「孔子的真面目」（乃至「其真面目是否可受尊崇」）而來的、對他人意見的反思，便一直延續至今。

不過，近代對孔子形象或孔子地位的討論，又另推展出不同於前人的視角——研究者不再將孔子的真面目視為考慮重點，反倒愈加關注論述者的意見。此間思慮，啟自康有為震撼清末士人的孔子論述。康有為一如前人般強調「真實的孔子」，但是他所謂的「真實」毋寧說是價值判斷勝過史實證據。縱使《孔子改制考》試圖撮舉文獻、多方舉證，其所謂「陳三世之法」，於「君主專制」之世擊劃「立憲法而君民同治」、「去君主，人民自治而行共和」的「孔子」，仍顯然出於康有為的塑造，旨在藉此「真孔子」體現康有為的政

²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9，孫啓治點校版），卷九，〈非儒下〉，頁300；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十九，〈顯學〉，頁1124。

治、文化理想。³此說一面擴展為清末民初興孔教的浪潮，另一面則增強了對於孔子論述中「論述者」之介入的覺察、甚至警戒。稍晚的顧頡剛雖仍總結地宣言：「我們要崇拜的，要紀念的，是這個真相的孔子」，卻也開宗明義地指出「各時代的人，他們心中怎樣想，便怎樣說」⁴，並以相當的篇幅闡發聖人、教主之說的由來。由此以降，研究者對於論述者意見的關注日漸增強。如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一文，目的已不在辨正此事是否合於史實，而是「想說明此一故事如何能假借孔子而出現」⁵，探討言說此故事者的思想傾向。朱曉海〈孔子的一個早期形象〉一文則更逕指：「上述在今人看來頗具神祕成分及色彩的部分確實是孔子原始諸多形象之一。如果有人覺得事涉迷信，則我們要提醒他們：『迷信』正是當時歷史文化的真實情境」⁶——此說已然明顯排除孔子真面目的問題，專注於論述者的想法（縱使涉及迷信）。

當視角轉移至「論述者的意見」，近代對「孔子形象、地位」的研究便以其所是地真正顯題。因為「孔子的真相」

³ 康有為：〈共和建設討論雜誌發刊詞〉，收入康有為著，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卷九，頁288。

⁴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139、131。

⁵ 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收入徐復觀著，蕭新義編：《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增訂再版），頁270。

⁶ 朱曉海：〈孔子的一個早期形象〉，《清華學報》第23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7。

乃以孔子為主體，並將相關言說視為一種必須如實呈現主體的「陳述」。但是這種視角並不符合關鍵詞本身的定義。畢竟，無論是否言有所據，「形象」與「地位」並不是主體本質的直接反映，而是添附於主體的外加之物。⁷其形成過程，必然要求主體之外的塑造者（乃至接受者）參與其中。甚至，看似為形象、地位所附加的主體（如孔子），只是其形象、地位塑成過程中的對象物。此間真正居於主導地位、具有能動性者，其實是作為言說主體的塑造者；該言說也因此不僅是一種陳述，而是以陳述為形式的論述。就此而言，以孔子形象、地位為論題關鍵字，與關注說者的意見、將其說視為其論，其實是先後開展出的一體兩面，二者共同形成近代孔子論述研究的內在思維。

由此，學界對於孔子論述的研究日興，各種不同學派、時代、地域的論述者成為研究對象，擴充此題研究視野。作為關鍵人物的康有為自不待言，清末民初的其他觀點且同時備受關注。⁸再則，歷來涉及此題的重要學者或文獻，也成

⁷ 橋本敬司將這兩種關注的區分，釋為「誰是孔子」與「什麼是孔子」（橋本敬司：〈記号化される孔子〉，《哲学（廣島哲學會）》第 58 期，2006 年 10 月 25 日，頁 137）。說參本章第三節。

⁸ 康有為說，參見唐文明：《數教在寬——康有為孔教思想申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宋德華：《從啓蒙維新到尊孔復辟——康有為政治與文化思想的演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8），第八章。清末民初諸說，如張衛波：《民國初期尊孔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島田虔次著，鄧紅譯：〈辛亥革命時期的孔子問題〉，《中國思想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393-422；吳震：《孔教運動的觀念想像：中國政教問題再思》（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1-25；林甘泉等著：《孔子

為關注焦點——如使孔子論述與民間信仰結合的讖緯、對孔子展現敬意的歷代《莊》學學者等等，皆以其特殊的孔子論述受到關注。⁹再至其他，則範圍尚及於來華傳教士、邊疆或少數民族、東亞或西方漢學家、歐美社會、早期臺灣文人等等。¹⁰總的來說，這些研究都旨在探討某一（群）論述者

與 20 世紀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又，相關討論或內含在孔教問題的論著中，舉要備參。專著，如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單篇論文，如陸寶千：〈民國初年康有為之孔教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2 期（1983 年 6 月），頁 81-94；黃克武：〈民國初年孔教問題之爭論（一九一二～一九一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12 期（1984 年 6 月），頁 197-223；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 年前後中國的心理危機與宗教興趣〉，收入王汎森等：《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陳熙遠：〈孔·教·會——近代中國儒家傳統的宗教化與社團化〉，收入林富士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0），頁 511-540；陳熙遠：〈「孔」「教」聯名的最後一搏：逆航在五四運動的風尖浪口上〉，收入呂妙芬、康豹主編：《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頁 113-157；魏綵瑩：〈民初的孔教理論與時代思潮（1912-1919）——以宗教、經典問題為論述中心〉，收入《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的調適與發展》，頁 159-192。

⁹ 讖緯之說，參見徐與無：〈作為匹夫的「玄聖素王」——讖緯文獻中的孔子形象與思想〉，《經緯成文——漢代經學的思想與制度》（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頁 246；《莊》學學者之說，參見徐聖心：〈「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臺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頁 21-66。

¹⁰ 略舉所見：來華傳教士之說，參見程艾藍（Anne Cheng）：〈「漢學」：法國之發明？〉，收入楊貞德編：《視域交會中的儒學：近代的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5-41；李爽學：〈「耶穌不滅孔子，孔子倒成全於耶穌」——試論馬若瑟著《儒交信》〉，《道風：基督教

如何塑造孔子的形象和地位；著重論述者的主體性，而非「真正的孔子」。

正是在此愈趨多元豐沛的討論中，近代孔子論述研究的共同關切——孔子的定位問題——也愈加呈顯。顧頡剛昔以「要崇拜、紀念的，是身為君子的真孔子」為文旨，除了暗中反駁康有為的教主說，實亦有意要在新舊學相爭、尊孔與批孔之論紛起的清末民初，重新界定「孔子」的身分地位。而近年出版的《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一書，編者黃俊傑指出：「孔子形象之建構與變遷，係東亞各國思想與文化變遷之溫度計」，將「體顯」出「儒家知識系統」與各國「政治權力系統」的關係¹¹，則是要藉由孔子的形象變遷，探討東亞各國如何定位孔子與儒家知識系統。——如何

文化評論》第 46 期（2017 年春），頁 27-43。邊疆少數民族之說，參見曾德明、林純瑜：〈西藏文化中的孔子形象〉，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論語學：中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頁 93-168；魏冬、益西群培：〈藏族傳統文化中的孔子形象〉，《西藏研究》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2 月），頁 33-41。東亞或西方漢學家之說，參見黃俊傑編：《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中之「日本篇」及「朝鮮與越南篇」；張堯欽：〈卡內提的孔子論述〉，《臺大中文學報》第 35 期（2011 年 12 月），頁 247-287。歐美社會，參見張濤：《孔子在美國：1849 年以來孔子在美國報紙上的形象變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陳其松：〈至聖先師與停滯帝國——19 世紀英國報章所見孔子形象與中國論述〉，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頁 387-428。早期臺灣文人，參見王淑蕙：《全臺首學：府城科舉制度與文化影響》（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第七、八章。

¹¹ 黃俊傑：〈引言〉，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頁 i。

在思想、文化相互激盪的脈絡中安頓孔子的定位？這個或隱或顯地內在於近當代孔子論述研究的疑問，提示：近代研究者對於各種不同孔子論述的探討，既可謂源自研究者自身對於孔子（及儒家）地位的關切，且可謂出於清末世變以來，有識者對於傳統文化價值的深切關懷。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與傳統中國文化）在思想、文化交會中的定位問題，遂成為孔子論述研究主要的意義方向。

而本書的討論，便循此論題視野前進，並將目光聚焦於周、秦、漢易代之際，探問：戰國到西漢晚期之間，人們如何定位孔子？又為何作此定位？這個問題看似已有顧頡剛的概論為解，實際上卻仍有大量需要梳理的文獻、以及值得深思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辨析。

第二節 問題意識 ——周秦漢之際的孔子定位問題

戰國到西漢晚期之間，是歷史上第一個秩序轉型時期。前承西周禮崩樂壞，遂群雄競力、百家獻策，終開啟漢後綿延的文化、政治秩序；下一次如此大規模的變革，須待晚清。雖然今人由後視前，不難清楚指出這段歷史進程的前後座標——由貴族封建到君主集權、自諸子爭鳴至獨尊儒術——，卻不應該將此簡單歸因某種一時決斷，而忽略此間諸多摸索、探問，乃至不同意見彼此權衡的互動過程。因此，近年的先秦兩漢研究便多方指出：戰國到西漢之間的政體及思想變化，實際上並非直接取決於一、二關鍵事件所帶來的戲劇性轉折。在關鍵事件的前後，人們對於應該轉出何

種新秩序、如何重新安排各種新、舊事物的定位等等問題，其實既有前行的發展脈絡，也有後續的檢討修正。政治體制上，有戰國時代對血緣宗法政治的持續挑戰，也有西漢政權對秦制既繼承且調整的推進。至於儒家地位，縱有漢武尊儒的成說，晚近卻也有諸多學者指出，漢代的「尊儒」早自漢初便已開啟端倪，且至西漢晚期才初步底定。¹²這是周秦漢之際孔子論述所處的歷史時空，也是其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因為值此秩序未定的時刻，孔子在後世政治中崇高且穩定的形象、地位，不僅並不理所當然，甚至可說尚未建立。然則，在這個尋求秩序轉型、一切重新定位的時代，人們如何看待、商榷「孔子」的定位？

顧頡剛提出了一個至今蔚為通說的論斷：「戰國的孔子是聖人，而西漢時的孔子是教主」（「教主」一語沿用自康有為，漢儒用語為「素王」）。何以如此？顧頡剛認為：春秋末期，一般人希望「有一個傑出的人出來收拾時局」，而孔子「人望所歸，大家希望他成為一個聖人，好施行他的教化來救濟天下」。在（戰國）儒者的「宣傳」與「揣測」下，孔子便成為一個「政治意味」的聖人。並且，由於一般人認為「聖人是特異的人，應當什麼都知道」，再加上「西漢的經學

¹² 漢武帝用儒為西漢儒家地位變化的標誌性事件，但是實際上儒家進入政治運作尚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學者一般認為要到西漢晚期。如聶保平所云：「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經由武帝的支持，逐步滲透到漢帝國的政治思想中，但在整個社會、思想和學術方面，儒學並沒有全面地佔據統治地位。……經過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的逐步扶持，儒學開始真正全面地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許抗生等：《中國儒學史·兩漢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163-164。）

本來就是宗教」，孔子便「浸入怪力亂神的醬缸裏去」，成為孔教的教主。¹³——此說不僅具有鮮明的標誌性，也包含前人未發的獨到觀察，遂成為近代孔子論述研究的先聲。

只是，作為先聲，顧頡剛的說法仍因囿於既有視野，遺漏了重要線索，進而使得其思想史解釋過於簡化。將戰國時說化約為「儒者」與「一般人」（且二者實相應和），顯示顧頡剛尚未注意到戰國孔子故事中，諸家學者的豐富論議。據戰國諸子文獻（並西漢輯本）所載，戰國之世大量流傳著各種孔子的言行故事。然而這類文獻材料歷來鮮少受到重視。因為，若以史實檢證的視角，判別是否確為孔子言行事蹟的真實記錄¹⁴，則這些故事極少能被檢證為「真」，反而是虛構之跡斑斑可考。有些人、事、時、地明顯失實，有些所述孔子言行與儒家思想要旨牴觸扞格，有些更出現多種版本（即人物與基本情節雖然相似，孔子言行的內容卻大相逕庭）。由此，往昔若非黜斥其文獻價值，就是置之勿論¹⁵，

¹³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 139、135、135-136、136、138。

¹⁴ 舉例來說，如徐復觀綜述前代學者（包括金末王若虛、明代陸瑞家、清代閻若璩、崔述、梁玉繩）對「孔子誅少正卯」故事的論斷：「綜合他們的論據，可以分為三點。第一是從思想上看，認為此事與孔子的整個思想不相容。第二是從歷史上看，認為在春秋時代，孔子不可能作出此事。第三是從文獻上看，此故事不見於『論』、『孟』、『春秋三傳』、『國語』、『大小戴記』等書。最早的見於荀子『宥坐篇』，及『尹文子』。荀子已及戰國末期，『尹文子』一書根本不可靠，所以此故事，是晚出的東西。」（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頁 270。）

¹⁵ 前者如劉知幾《史通》評劉向：「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蒲起

不再加以分析。¹⁶ 問題是，史實檢證的判定，其實從一開始

龍：《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482。）此指劉向所編著之《新序》、《說苑》，二書雖編成於西漢晚期，但主要收錄戰國文獻中的各種故事，其中亦包含許多孔子故事。後者則如嚴可均《書說苑後》云：「向所類事，與《左傳》及諸子，間或時代抵牾，或一事而兩說三說兼存，……良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不必同李斯之法，別黑白而定一尊。」（嚴可均：《鐵橋漫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浙江圖書館清道光十八年四錄堂刻本，卷八，〈書說苑後〉，頁47。）

- ¹⁶ 近年的新出文獻，更使得這個由來已久的偏限愈形突顯。因為新出文獻中出現了許多一則單行的孔子故事。若僅僅著眼於這些故事是否真為對孔子的陳述，則這些同樣真偽不明的新出孔子故事，也就只能一同落到置之勿論的處境。附及：目前出土文獻研究中有所謂「語類文獻」的說法，將《論語》（及《禮記》）之「最為可信」的地位取消，與其他孔子故事視為同類。就文獻學而言是一種重要的提法，然在思想內容的發展脈絡方面亦屬置之勿論的取徑，只是進一步將後人賦予的「經」的地位一併取消，匯入戰國文獻之整體。（參見張鐵：《語類古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4；俞志慧：《古「語」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種背景與資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夏德靠：〈論先秦語類文獻形態的演變及其文體意義〉，《學術界》2011年第3期 [總154期]，頁172-182。）另外，郭沂另提出「論語類文獻」之說，想要解決宋代以後只能以《論語》論述孔子生平的情況，主張將《孔子家語》等數部文獻一併視為可信文獻。然而，在視為史料的史實關切下，無法解釋異說的情況仍然存在。如孔子困於陳蔡的故事，僅《孔子家語》便在〈在厄〉與〈困誓〉兩篇中同時收有兩種不同的版本，若加上《論語·衛靈公》則有三種，因此即便從郭沂說，認定《家語》的「史料價值與《論語》不相上下」，亦無法進一步分析這些孔子故事何以不惟文字，即使內容的思想傾向亦可能人言殊。（郭說見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頁22-24；引文見頁22。）

就偏離了這些孔子故事的特殊性質。¹⁷如孫德謙所指出，戰國諸子文獻中的故事不能視為一種可求其實的事例，而是說者闡釋說理的一部分。¹⁸就此而言，戰國時代的孔子故事，既是說者對孔子的詮釋，為其孔子論述，且連結於該論述更深一層的問題意識，甚至可能藉著多版本的變異，蘊含說者對其他論述的回應。因而，是孔子論述研究不可忽視的文獻材料。

若將戰國孔子故事納入考慮，則顧頡剛所謂的「眾望所

¹⁷ 此處需要指出的是，史實檢證的方法取徑自有其考慮。因為歷代學者考辨孔子及文獻之「真實」，背後其實有建構（或云重構）學術典範的深遠用意，不只是辨析客觀事實上的真偽問題而已。如林慶彰討論經學中之辨偽時所指出：「經書的作者因為是聖人集團的成員，所以具有高出他書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一旦被認為偽作（非聖人集團所作），這種神聖和權威馬上會消解掉。」（林慶彰：〈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86。）就此而言，史實檢證的角度雖然會使得對於戰國孔子論述的研究有所侷限，卻可以展現出研究者自身孔子論述的一個側面。

¹⁸ 孫德謙《古書讀法略例·寓言例》云，諸子典籍載言載事，往往別有用意：「蓋古人不過取以備法，藉使後人有所適從，而其言或稍至失實，在讀者善會其意可也。吾謂學者遇此等處，不妨以寓言例之，無庸泥於其言也。……必問其事之有無，則滯矣。」（孫德謙：《古書讀法略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5，頁350-351。）又，余嘉錫《古書通例》「古書多造作故事」條亦云：「若夫諸子短書，百家雜說，皆以立意為宗，不以敘事為主；意主於達，故譬喻以致其思；事為之賓，故附會以圓其說；……而或者采彼寓言，認為實錄，……是皆見欺於古人，不免貽譏於來者矣。……夫引古不必皆虛，而設喻自難盡實，彼原假此為波瀾，何須加之以考據。」（余嘉錫：《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253。）

歸」與「儒者宣傳」，就顯然過度簡化了「聖人孔子」的由來。因為戰國時代的孔子論述並非只有儒者的聲音，非儒家學者的毀譽卻難一言以蔽，就連同部文獻中的意見都可能參差不齊。若云學派歸屬會決定對孔子的好惡，進而影響對孔子的定位，則孔子在許多非儒家學者話語中的正面形象，乃至各家學者的內部分歧，都會難以解釋。換一個角度來說，戰國儒者既然未能獨佔孔子論述的話語權，西漢初、中期儒者也沒有「獨尊」的實際地位，則「聖人」與「素王」這兩種抬高孔子地位的說法，為何能夠先後成立，其實並非想像中順理成章。

事實上，若回到道、政關係大致安頓之前，則如何定位孔子的政治身分，其實曾是一個飽含意見衝突與現實緊張的問題。後人習於儒家思想與政治運作兩相嵌合的後世秩序，往往認為儒家一直、也理應享有重要政治地位，並受到政權力量支持。然而周秦漢之際，政治體制正在調整，政治秩序與儒家思想的關係也尚未斟定。此時，許多後人看似老生常談或不值一哂的說法，背後其實都有一套對理想秩序的設計，並因此牽動相異觀點的回應。具體來說，例如孟、荀二家皆極力稱道孔子為聖人，董仲舒等西漢儒者則強調孔子不只是聖人，更是擬於君而通於天的素王。這些說法看似只是儒者尊師的尋常論調。惟若細究，士人出身的孔子如何可能作為聖人，掌握得以作用於政治的強大力量？孔子既然不是君王，是否可以在政治秩序中，享有如此崇高的身分，而不妨礙真正的掌權者？孔子與君王——以及二者各自代表的道與政——，又應如何相待？這些問題，將周秦漢之際關於政

治權力結構與道、政關係的種種設想，落實為孔子身分的討論。而「聖人孔子」這個可能妨礙君主集權的身分，不只引發諸子的正、反論爭，更進一步開展出不少相關的子議題。

進言之，沿著道、政關係的脈絡，便會看到西漢儒者尊孔論述的現實緊張與特殊性。從春秋戰國到西漢，時代大勢朝向建立君主集權體制推進，而儒家由力主周文轉為有所權衡，卻也持續推進其尊孔論述。問題是，西漢儒者為何、又如何能在極度尊君的新政治體制下尊孔？其所主張的「素王孔子」，究竟是承襲、變造、抑或重構了戰國儒者的「聖人孔子」？其說內在的道、政關係，之於現實中的新政體，是應和、反抗、抑或商榷？

反面來看，西漢皇權對尊孔論述的反應同樣啟人疑竇。衡諸西方歷史，擁有如此大量論述以塑造偉大形象的人物僅有兩種——神與國王。¹⁹ 而柏克（Peter Burke）分析以專制聞名的法皇路易十四如何塑造自身形象，便指出：由於「個人光芒有政治上的功用」、「國王身上的氣勢與光芒，是他們權力的一部分」。²⁰ 國王需要主導自身形象的塑造，俾以控制人民；同時，人民也可能同樣需要具有卡理斯瑪（Christma）特質的國王，仰其為日月。²¹ 掌握充滿「氣勢與

¹⁹ 關於神的形象，可參見帕利坎（J. Pelikan）著，楊德友譯：《歷代耶穌形象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該書舉出了耶穌自西元一至二十世紀中的各種形象變化。

²⁰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許綏南譯：《製作路易十四》（臺北：麥田出版，2012，二版），頁8、9。

²¹ 卡理斯瑪（Christma）意指「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具有這個特質而被認為是超凡的，稟賦著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

光芒」的個人形象，確切關乎君王的權力基礎。兩相參照，西漢並非沒有開出相同發展的契機。漢興前後早有將劉邦神化的各種傳說²²，賈誼《新書》且念茲在茲地要以禮制差等確立君王的崇高性。然而，包含武帝在內的西漢皇權，卻在「聖人」這個稱號上表現出極大的自制力。如邢義田所指出：「秦漢以降，皇帝的地位無疑趨向神聖化。值得注意的是漢代天子幾乎沒有自稱大聖或敢以聖王自居的。」²³既然「孔子」的形象、地位越是崇高，就越是可能妨礙皇權的光芒，為何著力鞏固、收攏皇權的武帝並不自稱為聖，卻能容忍董仲舒等儒者極力頌揚具有神聖性的孔子？或者，西漢皇權也自有其不明言的孔子論述，無聲地作為語境中的另一種聲音？

此一可能存在的角力，在西漢晚期（昭、宣、元、成四

或品質」。韋伯在分析支配的類型時，將此特質視為三種支配正當性來源之一。（韋伯著，康樂等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三）（修訂版）》，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二版，頁61；並參本書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點的討論。）而柏克則藉由此一概念說明路易十四輝煌形象的重要性，並指出，縱使不能認定人人都對此深信不疑，也不可忽略人民對於國王之偉大形象的心理需求。（彼得·柏克著，許綏南譯：《製作路易十四》，頁15-18。）

²² 這些神話性質的故事，對於劉邦塑造卡理斯瑪形象、鞏固權力正當性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皇帝身上的光芒」，可見西漢君主並非未曾留意於此。參見林聰舜：〈叔孫通「起朝儀」的意義——劉邦卡理斯瑪支配的轉變〉，《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37-42。

²³ 邢義田：〈秦漢皇帝與「聖人」〉，《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50-83；引文見頁59。

朝)的孔子論述中展開後續脈動。先是,兩場由官方舉行的會議,都出現了並不同意儒者尊孔論述、甚至貶抑「孔子」身分地位的說法。在昭帝時舉行的鹽鐵會議中,代表官方的大夫、御史對儒生的孔子論述多所譏評。史家目為西漢中興之君的宣帝,則在石渠閣會議中刻意扶植穀梁學,為其增立學官。——公羊、穀梁二家的經說雖然同異互見,對孔子政治身分的定位卻明顯不同。²⁴——不僅如此,兩場會議之後,元帝、成帝年間的儒者,一反西漢中期賈誼、董仲舒逕行論述孔子身分、地位的做法,重又彷彿如戰國及西漢初期儒者,選編大量孔子故事為說。若云這些發展即為西漢皇權對尊孔論述的回應以及儒者對皇權的再回應,雙方所持的論點為何?是否藉著斟定孔子身分,達成對道、政關係的基本共識?

「孔子」在政治秩序中的身分為何?周秦漢之際的眾多答案,看似源自對孔子人格成就的褒、貶,其實涉及說者對儒家思想的定位,甚至對道、政關係的安排。就此而言,周秦漢之際孔子論述的發展,仍有許多值得分析的議題及尚待尋繹的變化脈絡。戰國時代的眾多學者,如何將其理想政治秩序寄託於「孔子」身分定位的論述?其所開展的脈絡,如何向後影響秦漢的政治與思想,並轉出西漢儒者的尊孔論述?西漢時代的皇權與儒者,又如何能在君主集權與尊孔的緊

²⁴ 皮錫瑞:「《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為後王立法。惟《公羊》兼傳大義、微言;《穀梁》不傳微言,但傳大義。」(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春秋〉,「論穀梁廢與與三傳分別」,頁19。)本書第五章有進一步詳述。

張中，繼續探索、落實道與政的嵌合？這三個脈絡相續的提問，即是本書的問題意識，及本書各章的討論主軸。

第三節 既有研究成果述評

如前節所述，近代的孔子論述研究，以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為先聲。該文最初為民國十五年顧頡剛在廈門大學的演講，後收入《古史辨》，文中初始即開宗明義地解釋講題之源起：

今天講演這個題目，似乎是很可笑的，孔子只有一個，為什麼會變做兩個呢？唉，孔子哪裡止兩個，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即在一個時代中也有種種不同的孔子呢。……各時代的人，他們心中怎樣想，便怎樣說，孔子的人格也就跟著他們變個不歇。害得一般人永遠摸不清頭路，不知道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麼樣的。²⁵

文中並於兩處說明其問題意識：

我數年來，心中常有一個問題要求解決，這個問題是「孔子何以成為聖人？」²⁶

以及：

²⁵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 131。

²⁶ 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 131。

我們要崇拜的，要紀念的，是這個真相的孔子！²⁷

顧頤剛的說法不完全是孤詣獨造，遠則韓非子批評孔門後學自道真孔子，近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批評歷代學派相爭，是「浸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變為馬季長、鄭康成矣」，都已經涉及顧頤剛「他們心中怎樣想便怎樣說」之意。²⁸但是，顧頤剛真正質疑的焦點不只是變說孔子的後世儒者，更及於身為聖人、教主的孔子。表面話語雖仍呼籲眾人崇拜孔子，實質卻挑戰「孔子」深植人心的神聖地位與崇高形象，直指為戰國以後的附會與建構。此說在當時便得到許多回響，如傅斯年、張蔭麟、周予同等皆撰文表示贊同並相與討論；周予同並有後續論著加以進一步發揮。²⁹至今許多孔子論述研究仍然承襲其問題意識，或將該文作為預設的基礎，可以見出該文的深遠影響。

晚近二十年，討論孔子形象與地位的相關論著愈多，以論述者意見為關切的「孔子論述研究」愈趨成形之外，內容上的廣度與深度也逐漸累積而更進一步開展。以戰國到西漢

²⁷ 顧頤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頁 139。

²⁸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四版），頁 143-144。

²⁹ 傅斯年〈評「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張蔭麟〈評顧頤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周予同〈識緯中的孔聖與他的門徒〉，俱收入顧頤剛編：《古史辨》第 2 冊，頁 139-141、141-142、142-143。周予同的後續論述，可參見朱維錚對於周予同經學研究「孔子問題的真相」的主題性介紹。（朱維錚：〈中國經學研究五十年——《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後記〉，《中國經學史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 223-227。）

晚期這一段時間的研究來說，先是出現了許多論題範圍較小的單篇文章——這些論著不作一代的總評，而是針對某部文獻、某位論述者、某個關鍵詞等小範圍作個別的探討——；繼而，集合或整合個別探討，嘗試展現某一時代的整體圖象，甚或提挈跨代線索的思想史式研究，也開始出現。以檢閱所及，目前以戰國至西漢為論題時間跨度的著作，依出版時間序有：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吳悅禎《先秦兩漢孔子形象演變之研究》、陳瑩《先秦到西漢典籍中的孔子形象》、馮治利《論先秦到漢代孔子歷史地位的變遷》、鄭倩琳《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論儒道關係》、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伍振勳〈大儒與至聖：戰國至漢初的孔子形象〉。³⁰ 諸作各有所見，亦皆為本書所借鏡的前導。

進言之，在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三類研究成果與

³⁰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濟南：齊魯書社，2004）；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吳悅禎：《先秦兩漢孔子形象演變之研究》（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6）；陳瑩：《先秦到西漢典籍中的孔子形象》（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馮治利：《論先秦到漢代孔子歷史地位的變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鄭倩琳：《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論儒道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4）；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文與哲》第25期（2014年12月），頁21-76；伍振勳：〈大儒與至聖：戰國至漢初的孔子形象〉，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域中孔子的形象與思想》，頁1-30。

本書論題最為相關，分為：孔子形象的面向與意義、孔子故事的情節與內容、孔子地位的稱號與變化。以下即簡述此三類研究的概況，藉以說明本書的研究基礎，也指出本書將繼續探討之處。

一、孔子形象的面向與意義

這類研究主要探討孔子在戰國、西漢文獻中所呈現的形象。以此設題的研究數量相當多，論題多元以外，亦有不少深入的分析與觀察。

就論題及結構而言，這類研究大多選擇某部典籍（或篇章），討論其所展現的孔子形象；綜觀者亦多以典籍區別章節，可以說是前者的集合。其中以《莊子》的討論最豐。寓言故事本即《莊子》的研究要點之一，而《莊子》中以孔子為主角或主題的故事不僅數量頗多，且出現數種不同、甚至衝突的人物形象設定，致使《莊子》中的孔子形象一題很早便已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再加上此一問題牽涉儒道思想的交會，因此近年中外學界仍陸續出現相關的探討。——《莊子》之次，《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史記》亦頗受關注；再次，則有《呂氏春秋》、新出文獻（郭店簡與上博簡）及《淮南子》。由於各以典籍成說，這類研究以呈現諸說的分立為重點。除了《史記》乃因其刻意撰寫之〈孔子世家〉而受到重視並自有其討論脈絡之外，其他典籍的選題及旨趣，大致可以看到研究者有意呈現戰國諸子的多元論述。惟相較之下，研究者明顯較少關注西漢文獻呈現的孔子形象，雖然如《新語》、《韓詩外傳》、《新序》、《說

苑》、大、小戴《禮記》等，實皆含有相當多稱述孔子的材料，有待研究者的探索。此外，在著重展現「分立」的結構安排下，即便是研究成果較豐的戰國時代，對各種論述間之互動關係的探討亦不多見，然而這種情況不僅與戰國以降各種思想激盪的時代背景相隔闔，也不易真正展現一種共時性的孔子論述圖景，甚至不易尋繹歷時性脈動的軸線。因而亦有待後續的發展。

就內容及方法而言，這類研究的討論內容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其一，歸納整理孔子所呈現出的各種面向，著眼點包括孔子在該文獻中予人的印象、主要的活動、論述者對於孔子或儒家所抱持的態度、稱述孔子的重點等等。³¹此一層面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可謂孔子形象及孔子地位研究的基礎。不過，由於研究者的著眼點或表述方式不同，所得出的觀察往往各有意趣。其二，闡釋孔子形象之重點面向的涵意。一種做法是分判此面向屬於正面或者負面，進而說明論述者如

³¹ 以陳瑩《先秦到西漢典籍中的孔子形象》第一章「先秦諸子中的孔子形象」為例，該文在分為「儒家文獻」與「非儒家文獻」兩類後，再將各部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歸納出幾種主要的面向：《論語》有「學者之孔子」、「導師之孔子」、「君子之孔子」、「性情之孔子」；《孟子》為「在論事說理時，以孔子之語作為理論依據」、「在論事說理時，以有關孔子的事蹟作為事實論據」、「直接評價孔子」；《荀子》則有「有關學習之道者」、「有關為人之道者」、「有關為政之道者」三類；《莊子》先分「莊子學說的代言人、得道真人」、「被改造的對象，介乎俗聖之間的學者」、「被攻擊的代表，現世最大的盜賊」，又分「虛心求教，務求真理」、「死守仁義，營謀天下」、「追求隱逸」。（陳瑩：《先秦到西漢典籍中的孔子形象》，頁 5、6、8、10、11、13、14、18、19、20。）

何及為何如此褒貶孔子；另一種做法則是根據論述者所選擇的面向及其所建立的孔子形象，探討論述者的思想。其三，由於某些文獻的斧鑿之跡過深，顯然出於論述者的造作——例如明顯的變造或假託、刻意而不真實的詆毀、內部出現評價的衝突等等——，研究者或因而進一步分析孔子在其中的「功能性」。例如作為寓言人物、作為儒家或世俗的象徵性代表、轉化為論述者的代言人、在論述中符號化地作為某種形式角色等等。

探討論述者思想的研究目前並不多見，卻是一種相當重要且有待開展的做法。細究之，這類研究的取徑又可以分為內部及外部兩種。前者是將孔子形象之重點面向的涵意，聯繫、結合該部或該篇文獻的整體思想來作討論，旨在向內探討論述者自身思想體系（藉由孔子論述所反映出來）的一個側面。以鄭倩琳《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論儒道關係》第二章對《莊子》內篇的討論為例，作者闡釋「論處世之道的孔子」、「論修養工夫的孔顏」、「論聖人境界的孔子」及「論禮制的孔子」四種面向，指出《莊子》內篇中孔子形象的涵意為「既可說明世事之複雜難解，又可證明心靈在此中有超越的可能」，而此一涵意在《莊子》內篇整體的思想體系中的意義是：「溝通了凡與聖、方內與方外的隔閡」，並且使「儒道兩種不同的生命取向進行溝通」。³²如前述，先秦諸子對孔子言行事跡的稱述往往作為其思想論述

³² 鄭倩琳：《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論儒道關係》，頁39、40。

的一部分，因此此一連繫、結合的工作，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說明論述者言說某種特定形象之孔子時的思考。至於後一種外部的取徑，則是將孔子形象的涵意，聯繫至當時政治、社會、思想等各方面的歷史背景，旨在探討論述者用意所內含的思想史線索。伍振勳〈大儒與至聖：戰國至漢初的孔子形象〉一文即可為例。該文統合多種文獻，以典範、固窮、事功三方面的孔子形象，結合各文獻之思想要旨及戰國至漢初的政治、社會變化，指出戰國到漢初之間，論述者所著力塑造的孔子形象「從儒者可學、可及的『大儒』式聖人轉化為具有至高無上之神聖性的『至聖』」，並且其「參與政治的實踐模式」，也由以「行動者」為主變為以「立法者」為主，而此轉變乃是伴隨著戰國晚期至漢初「知識文化的轉型」與「知識結構的調整」而來。³³此一取徑不僅可以探討論述者的思想，且能進一步展現出孔子形象變化的思想史意義。如以上兩例所示，這類探討論述者思想的研究可以加深、擴大孔子形象的意義脈絡，使討論不再囿限於文本的字面指涉，而能夠更深入地探討論述者如何在其思想內部或所處時代中塑造孔子的形象，甚至能夠進一步繫連出思想史的脈絡，因而尚蘊含著許多待探問的主題、以及後續開展的空間。

至於指出孔子在論述者話語中之「功能性」的研究成果，則是出現了不少可以進一步思考的說法——特別是「代言人」與「符號」二說。「代言人」角色是一種有趣的現

³³ 伍振勳：〈大儒與至聖：戰國至漢初的孔子形象〉，頁 28、29。

象。此說已為許多研究者指出，且最常見於《莊子》、《韓非子》研究，如莊文福云：「孔子在《莊子》中的形象雖然多變、立場亦有不同，但主要仍是莊子闡述其思想理念的工具罷了」³⁴；林存光云：「當孔子作為先哲時賢被莊子借重時，實際是以莊學代言人的身分或面目出現的」³⁵；吳悅禎云：「第二種是法家化的孔子，韓非巧妙地轉化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變成嚴刑峻法的贊同者」³⁶；而徐復觀在探討《韓非子》中的孔子故事時同樣指出：「由這三個故事看來，孔子已經變成法家的代言人」。³⁷ 孔子既是人盡皆知的儒家宗師，上述兩部文獻亦皆自覺地別於儒家的論說，因此以代言人形象出現的孔子，可想而知地出於論述者刻意安排。研究者一般將這種現象解釋為論述者譎託或利用孔子名聲宣傳，但是此間的因果關係是否如此單純，卻可再商確。如林存光所云，這種行為同時「暗示了對孔子作為一位眾所周知的『賢哲』的肯認」。³⁸ 然則，孔子擔任代言人所反映的論述者意見，仍可作更多角度的思索。

而孔子在論述者言說中作為某種形式性「符號」的現

³⁴ 莊文福：〈《莊子》中的孔子形象探析〉，《馬偕學報》第3期（2003年5月），頁247-262，引文見260。

³⁵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頁71。

³⁶ 吳悅禎：《先秦兩漢孔子形象演變之研究》，頁118。

³⁷ 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頁276。

³⁸ 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頁71。

象，也相當值得注意。論及於此的研究數量尚不甚多，卻提出了有趣的觀察。其中，橋本敬司的〈被符號化的孔子〉（記号化される孔子）是目前唯一以此專題為文的研究。³⁹ 該文提出，與其問「誰是孔子」（孔子とは誰か），不如問「甚麼是『孔子』」（孔子とは何か），因為從《孟子》到《荀子》稱述孔子的變化看來，孔子不只是一個話語被引用的歷史人物，更成為一種對話故事中的角色——說話人（語り手）。作者認為此一角色不僅提示「孔子」在（孔子故事）敘事中的作用，並且可以再擴大地用以探討先秦諸子的言說。另外，Lionel Jensen 亦在〈古代敘事中孔子的起源：作為歷史的比喻〉（“The Genesis of Kongzi in Ancient Narrative: The Figurative as Historical”）一文中，因戰國至西漢多樣的孔子形象與孔子故事敘事，大膽地提出將「孔子」考慮為一種「不固定的能指符號」（a free-floating signifier）。⁴⁰ 編者 Thomas Wilson 於導言中評述，認為讀者不必非得同意該文將孔子視為一種「象徵的人造物」的說法，卻可以注意該文對於將一種崇拜對象（icon）不假思索地視為具體事物之習慣的挑戰。⁴¹ 這些指出孔子在敘事中之符號性質的說法，以

³⁹ 橋本敬司：〈記号化される孔子〉，頁137-150。該文的英文題名為“Confucius Who is Symbolized”。

⁴⁰ Lionel M. Jensen, “The Genesis of Kongzi in Ancient Narrative: The Figurative as Historical,” in Thomas A. Wilson ed., *On Sacred Grounds: Culture,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Confuciu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p. 175-221; quoted in p. 214.

⁴¹ Thomas A. Wilson, “Introduction,” in Thomas A. Wilson ed., *On Sacred*

及前述研究所討論的代言人角色，皆指涉著孔子論述中之「孔子」與其人歷史真實脈絡的分離，並因而指向更抽象、且更理論性地思考孔子論述中之孔子的作用。對於論述者所論之「孔子」的性質與意義，遂可由此作更深入的探討。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於戰國至西漢文獻中的孔子形象，已經累積許多研究成果。不僅對於孔子形象的各面向作出相當豐富的整理與分析，而且對於這些面向所展現的意義，也有許多不同角度的思索。惟藉由現有的成果，也能夠看到許多可以再拓展、追問的端緒，因而仍有待後續探討，亦涵蘊本書踵繼之處。

二、孔子故事的情節與內容

這類研究主要探討戰國至西漢文獻中以孔子言行事跡為主題之孔子故事的情節或內容。相關論述不在少數，惟視角與著重點相當不同。根據研究者對孔子故事的性質定位，可分為歷史事件、神話傳說與論述題材三類。

(一) 歷史事件

這類研究將孔子故事定位為歷史事件的陳述，並考辨其

Grounds: Culture,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Confucius, p. 28. 又，戴梅可 (Michael Nylan) 在其著作《幻化之龍》中回應此說，認為「孔子」的意義是否如 Jensen 用語所指仍可商榷，但也同樣指出了孔子在漢代已經具有多重角色，並非只是孔子其人而已。See Michael Nylan, "Kong, the Uncrowned King," in Michael Nylan and Thomas Wilson, *Lives of Confucius: Civilization's Greatest Sage through the Ages* (New York: Doubleday, 2010), p. 97. (該書中譯本為戴梅可、魏偉森著，何劍葉譯：《幻化之龍：兩千年中國歷史變遷中的孔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情節、內容的真偽，亦即前文所謂「史實檢證」視角的研究。由於是前賢治學重點，相關研究成果甚多。重要的集成之作，有崔述《洙泗考信錄》與錢穆《先秦諸子繫年》。⁴²《洙泗考信錄》以孔子生平事件為綱，考辨相關言行事跡的真偽。歷來對於孔子生平的考辨通常依於經籍說解，崔述卻刻意以此為主題著書，是其開創之處。而《先秦諸子繫年》雖然並非專為考察孔子生平資料所作，但書中共有二十六篇關於孔子及弟子生平事跡的考證，大抵囊括了前人在這方面詳加考辨、爭訟的主要議題，且較崔述之考證精平詳實，其成果因而可以作為指標。前述史實檢證的視角會侷限孔子論述研究的視野，但是史實檢證視角的研究成果對於孔子論述研究仍有重要價值。因為那些含有造作之跡的故事情節，或許正蘊含說者的孔子論述，而前賢所考便可指出此類造作之跡，為孔子論述研究提示切入點與著力處。

(二) 神話傳說

這類研究將孔子故事定位為民間文學中的神話傳說，並根據民間文學研究的觀察重點，分析其中情節與角色的設計安排。而研究者最為關注的兩個重點，一是情節安排與人物設定背後的世俗心理，二是多版本孔子故事所呈現的類型化發展。⁴³

⁴² 崔述：《洙泗考信錄》，《孔子世家附洙泗考信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外一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⁴³ 群眾的世俗心理乃是民間文學有別於個人創作的基本性格，也是民間文學研究的關切重點。而類型化的發展則是民間文學在形式內容上的

二者相較，世俗心理的相關討論較多。如顧頡剛的一篇短札〈孔子遇難；子路與張飛、李逵〉云：「凡是一個聖人，照民俗心理，一定要度過許多難。……孔子之圍於匡人，圍於桓魋，圍於陳、蔡大夫，亦是如此。……民俗的腦中，見得聖人一定受災難，但一定有救星，不會死。這是一個極普遍的方式。」⁴⁴而陳金文分析孔子故事，同樣指孔子出生的傳說（野合而生）「並非是有意醜化聖賢，而恰恰是民間沿用描述英雄或偉人出生時常用的敘事模式，將孔子的出生傳奇化。」⁴⁵袁珂〈孔子與神話及民間傳說塑造的孔子形象〉一文，則更進一步地將孔子崇高形象的由來，整體地解釋為「以世俗各自誇張的心理，將孔子塑造為一個形體稟賦俱異於人的人物」。⁴⁶雖然世俗心理尚不足以簡單化約孔子形象的複雜成因，卻可以由此見出：戰國至西漢間所謂的孔子論述，並不只是少數學者之間的討論，而具有比既有研究預設更加廣泛的社會基礎與影響層面。這一點一方面提示著孔子論述之研究題材的範圍可以更加擴大，不必侷限於二三思想家或特定文獻（如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

特色之一，研究者將表現此特色的性質稱之為變異性，為民間文學的四種主要特性之一。（參見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概論（修訂本）》，臺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頁29、38。）

⁴⁴ 顧頡剛：〈孔子遇難；子路與張飛、李逵〉，收入顧洪編：《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頁276。

⁴⁵ 陳金文：〈孔子「野合而生」乃民間傳說〉，《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4期（2004年10月），頁114。

⁴⁶ 袁珂：〈孔子與神話及民間傳說塑造的孔子形象〉，《文學遺產》1995年第1期（1995年1月），頁4-11。

子畫像研究》，便根據漢代畫像石所見之史料，指出「孔子見老子」這一故事在漢代的社會史意義。⁴⁷ 二方面，也提示研究者可以將整個時代或某文化群體之全體成員納入考慮範圍，更加開闊地探討孔子論述的形成、發展、影響，甚至進一步作出方法論的新思索。

另一方面，孔子故事在人物、情節方面的類型化發展亦為關注焦點。「類型化」(genre)是民間及口頭文學的重要特徵，意指由某些相似的情節或人物角色，構成某種固定的敘事模型，惟細部有所「變異」(variability)。⁴⁸ 而孔子故事類型化的例子所在多有。故如陳金文《孔子傳說的文化審美研究》一書⁴⁹，便結合典籍文獻及當代的田野調查資料，歸納整理出歷來孔子故事的類型主題。由此進言之，周秦漢孔子故事的樣態符應於民間文學的特徵，又提示孔子故事在當時流傳的動態過程。即，不同版本之孔子故事的差異，可能並非只是無意中的傳聞異辭，而是由於當時人們將部分情節或人物設定視為共同的固定模型，其餘便依照傳述者的意見自由變異。然則，不同版本之眾多傳述者以何為共通處，又於何處變異，便為探析箇中思慮的線索。研究者因而有需要考慮多版本故事中固定與變異兩部分所內蘊的論述者意見，並且更加注意下一類研究的觀點，即：將孔子故事

⁴⁷ 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8）。

⁴⁸ 參見譚旭東：〈文學類型化探析〉，《中州大學學報》第24卷第1期（2007年1月），頁42-44。

⁴⁹ 陳金文：《孔子傳說的文化審美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視為某種共同的論述題材。

(三) 論述題材

這類研究聚焦特定的孔子故事情節，探討論述者言說此事的用意。孔子故事在此並不被視為歷史事件或神話傳說，而是論述者刻意選擇、創造，以進行其思想論述的題材。此一視角晚近方興，因此相關研究的數量及主題不如其他類型的研究來得豐富。最具規模的論著為渡邊卓《孔子傳之形成》（孔子傳の形成）第二編「孔子故事之思想史的研究」（孔子說話の思想史的研究）⁵⁰，該書之綱目顯示作者有意整體探討戰國至西漢各類孔子故事所共同「塑成」的孔子生平。惜該書為依照作者生前自訂綱目與已發表之相應文章所編成的遺著，因此不少綱目的內文從缺，作者的整體構想亦僅能由現有篇章窺見。至於其他單篇論著，則綜觀有兩大焦點——孔子誅少正卯及孔子困於陳蔡——，各自採取不同類型的研究取徑。

「孔子誅少正卯」引起關注的原因，主要起於其情節內容的非真實性。這則並見於《荀子》、《新語》、《淮南子》、《史記》、《說苑》等書的故事沒有出現不同版本的異說，卻有許多證據指其並非實事（參見前節註14引徐復觀的整理）。近人因而開始分析其中所蘊含的傳述者思想。專題為文者，有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夏長樸〈子為政焉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

⁵⁰ 渡邊卓：《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孔子傳の形成〉と儒墨集團の思想と行動》（東京：創文社，1973）。

⁵¹，以及渡邊卓書中第二編之第二章「少正卯」（原以〈少正卯——孔子說話の思想史的研究 その四〉為名發表於《東方學》）。三篇文章都從故事文字內容析論傳述者的觀點，並連繫至戰國思想發展的整體脈絡，惟取徑上又各有創見。渡邊卓以《荀子》之文為本，將故事中孔子對何以誅少正卯的解釋，比對《荀子》中的相關論說，並以戰國晚期的社會、思想發展為輔，指出這則文字反映出荀子的刑罰觀。徐復觀則是先分析孔子之言的思想傾向，指出「這是與法家思想及專制政治有密切關連的故事」，並列舉《韓非子》中其他關於誅殺與刑罰的故事比對互證；再則從用語、說法的變異，尋繹各版本的發展脈絡，嘗試闡明：「一個故事的發生，固然有其思想與時代的背景；但對於同一故事的觀點與解釋，也會隨著思想與時代為轉移」。⁵²而夏長樸同樣自分析孔子之言的法家思想傾向切入，再結合戰國晚期學術發展的融合趨勢，指出：「雖然不一定能證實法家出自儒家，但卻是戰國末期儒、法合流現象的一個具體的佐證」，是「戰國末期荀學與法家合流的產物」。⁵³在以上各種取徑之中，徐復觀之文以用詞序列「誅少正卯」故事之思想發展的做法稍可商榷，因為誅少正卯故事正好涉及官名等歷史資料，可供判定「部分詞語的」寫成時間，而且時間排序需要細密而

⁵¹ 夏長樸：〈子為政焉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儒家與儒學探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頁 87-124。

⁵² 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頁 286。

⁵³ 夏長樸：〈子為政焉用殺——論孔子誅少正卯〉，頁 124。

大量的論證支持，然則此一研究方法（正如作者自云是「大膽的嘗試」⁵⁴）並不容易成立，也不容易推展至其他孔子故事的研究。不過在此之外，上述三篇文章將這則故事與所在文本之相關論說、相近學說之思想觀點、以及所在時空中之思想史趨勢相結合，開展並定位「誅少正卯」故事的意義脈絡，實為後續的孔子故事研究指出了重要且值得參考的三種取徑。

「孔子厄於陳蔡」的討論焦點則正與「誅少正卯」相異。「厄於陳蔡」故事的文字及內容本身沒有悖於史實的證據，問題在於此一故事在戰國西漢文獻中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版本。（參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這些版本不同的故事因之不可能全為真實記錄，故而引起研究者注意，加上新出文獻中亦包含不同版本的陳蔡故事，致使近年出現不少相關討論。綜觀所論，研究者的關注大致有兩個重點：一是各版本的思想來源是否相同，二是各版本所共同展現的思想議題為何。以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前一種譜系式關注的問題在於，各版本的思想來源其實並不容易確切論證。主張系出一源者，將內容相似的版本繫連起來，排出發展順序，提出頗具新意的說法。⁵⁵但是戰國至西漢文獻寫成的時間先後已經很難確定，要證明師承關係更非易事。即使不考慮戰國時代

⁵⁴ 徐復觀：〈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頁270。

⁵⁵ 李學勤：〈天人之分〉，收入鄭萬耕主編：《中國傳統哲學新論：朱伯崑教授七十五壽辰紀念文集》（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頁239-244。

的學術環境本無後人所謂師法家學，各版本所出典籍也並非出自相同的思想家派。就此而言，如陳少明〈「孔子厄於陳蔡」之後〉所云：「不同時代不同家派的學者，均踴躍參與這個故事系列的創作」⁵⁶，或如王中江主張源流問題難以遽下定論⁵⁷，應該更接近「厄於陳蔡」故事實際的發展狀況。相較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後一種關注思想議題的研究。研究者根據基本情節與共通內容，提引出「厄於陳蔡」故事所意蘊的思想議題，並將各種同類型版本的變異，視為傳述者對此議題的回應。如王中江〈《窮達以時》與孔子的境遇觀〉一文⁵⁸，便指出「厄於陳蔡」故事各版本的不同思路，並以「境遇觀」一語標舉此一系列故事的共同主題。類似的切入手法並見於于淑娟〈《韓詩外傳》的貧困考驗主題及其文學價值〉，作者指出：「《韓詩外傳》中，有許多孔門弟子安貧樂道的故事出現，形成了貧困考驗主題」⁵⁹，該文雖以小說敘事主題為研究方向，其研究路徑卻同樣呈顯出類型化孔子故事中的思想議題。這種視角將共同故事情節視為不同論述者（或傳述者）所共享的議題，不僅可以與前一類研究所指出的類型化特徵相應，更可以為孔子論述研究開啟跨文獻的

⁵⁶ 陳少明：〈「孔子厄於陳蔡」之後〉，《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 104-119；引文見頁 105。

⁵⁷ 王中江：〈《窮達以時》與孔子的境遇觀〉，收入董平主編：《浙東學術》第 1 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頁 99。

⁵⁸ 王中江：〈《窮達以時》與孔子的境遇觀〉，頁 92-114。

⁵⁹ 于淑娟：〈《韓詩外傳》的貧困考驗主題及其文學價值——兼論孔門弟子的安貧樂道形象和故事演變〉，《蘭州學刊》2006 年第 7 期 [總 154 期]（2006 年 7 月），頁 85-88；引文見頁 85。

討論路徑，而有待更多的探索。

另需補充者為，在以上三類研究成果之外，並有研究者以敘事學分析的角度切入，將這類文字提稱為「孔子敘事」。如李隆獻〈先秦漢初雜家文獻中的「孔子形象」〉一文，便藉由分析及並比敘事手法，探討《呂氏春秋》及《淮南子》所塑造的孔子形象及其特色，既以敘事學拓展分析孔子故事的方法，且由探討敘事者安排而將孔子故事連接至孔子形象塑造，為孔子形象研究轉入孔子論述指出一種可待開展的後設視角。⁶⁰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於孔子故事的研究，雖仍處於開端，且不若前一類孔子形象研究的數量之多，但是其中多種出於不同視角、觀點、取徑的研究成果，卻為孔子論述研究提供了尋繹論述者意見的多樣線索，並且可以展現在現有孔子形象與孔子地位研究中不易看到的側面。孔子故事因而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探索與追問，並與孔子形象、孔子地位的研究成果相結合，更完整地呈現戰國至西漢的孔子論述。

三、孔子地位的稱號與變化

這類研究主要探討周秦漢之際孔子地位的變化，並聚焦在相關論述中的關鍵稱號——「聖（人）」與「素王」。前者自戰國時代便備受討論，後者則是漢儒用以尊崇孔子的主要說法，遂成為探討孔子地位（及地位變化）的兩大大切入點。這類研究的設題範圍與前兩類的情況略有不同。因為聖

⁶⁰ 李隆獻：〈先秦漢初雜家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政大中文學報》第29期（2018年6月），頁127-173。

(人)或素王二詞皆自有其豐富的意義脈絡與牽動其他論題的重要性，本身可以自成論題，所以許多相關論著是逕以關鍵詞為題，未明示為孔子地位研究。惟細究問題意識與內文，研究者在討論時確實意識著此間存在某種論述者加於孔子、欲以改變孔子地位的意見，並且由此提出某種屬於孔子論述研究的觀察，因此以「孔子地位」設題的論著雖不如「孔子形象」之多，實際上卻有不少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

從問題意識及取徑分析，這類研究大致上有一共同的疑問：孔子何以得此地位？（亦即，何以將孔子塑造為聖人或素王？）而在此共同的關切之下，又可以分為兩種取徑。一種是，研究者扣住該關鍵詞的詞義，以一套既有的理論架構解釋孔子地位的成因，並說明其發展過程。如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便在劉澤華所提出之王權主義的理論架構下，以「聖化模式」與「王道二分」論析聖人說與素王說的發展及目的。至於另一種取徑則是，研究者先將該詞彙置於某種可以連繫至特定論述者的背景（如某一文本或某位學者），再將孔子的地位問題連結到該背景所可能延伸的意義脈絡。如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便依據董仲舒之公羊學，指出將孔子說為素王，可以「使《春秋》帶有體現天意的神聖性」⁶¹；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則是根據《史記·孔子世家》的情節安排，分析司馬遷「將孔子生平塑造為神聖典範」的方式與用意。⁶²

⁶¹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167。

⁶² 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清華學報》第39卷第2期（2009年6月），頁227-259；引文見頁253。

進言之，由研究者所推展的意義方向，又可看到這類研究的兩點內在關切——儒家的政治定位、以及漢代的典範塑造。前者可以諸家對素王說的討論為例。關於董仲舒以孔子為素王的用意，目前學界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或云是儒生為了鞏固儒教地位——如淺野裕一《孔子神話》認為，孔子不遇而終的歷史事實，是儒家德治理論無法落實於現實政治的重大破綻，因此後來的儒者開始建構孔子為素王之說，用以填補理論的缺漏。⁶³或云是西漢公羊學欲以《春秋》指導漢朝政治的理論基礎——如黃開國指出，若孔子受命於天，則「孔子著《春秋》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著書立說，而是受命改制，是天意的體現」。⁶⁴或云是為了制衡君權——如馮樹勳〈董仲舒從師到素王的心結〉認為，由於儒生的王者「師」地位下降為「臣」，「為了作出一定的抗衡，董生試圖把孔子和《春秋》的地位提高，於是便引生了孔子為素王之說」。⁶⁵或云是為了與政統對立，突出道統高於政統——如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認為，西漢儒者欲「使王與道相對二分，政歸於王，而道歸於聖」，因此「董生堅信素王為帝王立法，堅信道統高於政統，此儒術所以獨尊」。⁶⁶眾說雖各有不同，綜觀卻都圍繞著儒家如何在漢政中立足、

⁶³ 淺野裕一：《孔子神話：宗教としての儒教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44-48、318-319。

⁶⁴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頁167。

⁶⁵ 馮樹勳：〈董仲舒從師到素王的心結〉，《陰陽五行說的階位次序——董仲舒的儒學思想》（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頁268。

⁶⁶ 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頁206、208。

乃至如何使道、政共處。這個涉及道、政關係的關切本就是思想史中的一大課題，學者聚論遂理所當然。惟換個角度來說，這些聚焦「素王」的論著，不啻提示孔子論述之於儒家政治定位問題的重要性。

與此相關聯的另一意義方向是典範的塑造。因為在尋找定位的同時，整個時代也縈縈牽念於重修秩序與建立典範。⁶⁷ 尤其漢家尊經以後，孔子的身分位階便與五經的正典地位互相糾纏。學界目前的討論已及於此。如吳悅禎《先秦兩漢孔子形象演變之研究》便認為孔子的「權威」地位與五經（乃至儒生）的地位相生互成：「今文學家為了抬高孔子「素王」的地位，故而鞏固經典（尤其是《春秋》）的權威，再借解釋經典以自重，進而捍衛孔子於至高的地位而不墜，復以詮釋經典的權威性確立並鞏固今文家的政治地位及力量，

⁶⁷ 在政治方面，如陳蘇鎮所指出：「如何認識和確定『漢道』，是漢朝統治者思考了四百餘年的問題」；所謂「漢道」，即一種可以恆守的「治國治天下之道」。（說見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二版；引文見頁2。）而在學術思想方面，不僅經學的推尊是西漢一代的重大事件，並且尋求某種具神聖性的典範文本，其實可以考慮為一種時代性的思考。普鳴（Michael Puett）〈聖境的誘惑／早期中國神聖書寫的興衰〉便指出：西漢時代「聖人創造連結天境與人間（Heaven and Earth）的文本，並以之作為給後世的指南」的說法，其實不只專屬孔子。（See Michael Puett, "The Temptations of Sagehood, o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agely Writing in Early China," in Wilt L. Idema ed., *Books in Numbers: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2007), pp. 23-47; quoted in p. 33.)

如此反覆循環加強」。⁶⁸ 而前引伍振勳文則明以「典範」為說，指出《史記》聖人敘事的情節脈絡不僅「將孔子生平塑造為涵蓋政治事功、文化精神、政教律法的神聖典範」，且因以「確立漢代以『六藝』為神聖正典的政教規範。」⁶⁹ 只是，漢儒此番推昇的基礎為何？有何考慮？是否成功？皆仍有待繼續追問。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孔子地位問題的探討，已深刻觸及戰國至西漢思想史的重要議題。只是或將孔子論述置於印證某種既有觀察或理論架構的附從地位。當孔子論述成為主角，是否可能從新的側面展現不同圖景？尤其，如目前研究成果所示，孔子地位問題與周秦漢的歷史脈絡牽連甚深，更涉及政治秩序的建構。孔子論述本身所推演出的思想史脈絡，遂值得投注更多考慮與探索。

以上簡要地分類及述評了目前與孔子論述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除了呈現近年研究動態及進展之外，也指出可資借鏡與開展之處。既有的討論雖常被打散在不同的主題下進行，但是近年學界的關注與探討日廣、日深、日專，適足展現周秦漢孔子論述的重要性與可能性，而本書亦將由此續作推進。以下，則就本書所採取的研究範圍、方法、架構等作相關說明。

⁶⁸ 吳悅禎：《先秦兩漢孔子形象演變之研究》，頁 193。

⁶⁹ 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頁 253、248。

第四節 研究設計相關說明

本節將分三部分說明本書的研究設計：「研究範圍」，說明本書的研究對象、時間斷代、及文獻範圍的畫定與分層；「研究方法」，說明本書所參照之方法論，並藉以說明本書整體的視角；「章節架構」，則從三個角度說明本書的結構安排。

一、研究範圍

說明本書的研究範圍前，首先需要界定本書的研究對象。如前文所言，孔子論述即論述者藉著塑造孔子形象、地位所表達的意見、觀點、思想。此間，「孔子」是被論述的對象，而非論述的主體。換言之，本書所要研究的對象，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言說「孔子」者的思想；本書研究中所關注的「孔子」，亦不是生於春秋晚期的孔子其人，而是在戰國至西漢晚期之間眾人言說中的「孔子」。本書第二章將指出，「孔子其人」與「眾人言說中的孔子」二者之間的意義區隔，隨著戰國孔子論述成形而愈趨清晰。二者因而雖非無關，卻並不同。為便於讀者理解，本書在戰國中晚期以後的討論中，將使用不加引號的孔子或孔子其人表述前者，並以加引號的「孔子」表述後者。至於無法清楚區分的情況，論及春秋至戰國初期孔子論述未出現及成形之初時，概以前一種方式提稱；論及戰國諸子的議論及戰國中、晚期以後的發展時，則視情況兩種方式並列、或另作說明。

據此，本書所討論的具體對象（文獻材料）為以下三種：對於孔子的稱道（褒貶或評論之辭）、對於孔子事跡的

傳述（孔子故事）、以及對孔子之言的引用。其中，第三種材料的納入需作說明。因為將引述孔子之言的段落視為孔子論述，可能會引起疑問——是否認定該段文字並非真為孔子之言，而是後人所造？如前所述，本書不擬專題考辨真偽問題，而第三種材料在本書中的作用，亦不在於呈現孔子說了甚麼，而是說者如何說「孔子」。換言之，本書將說者的引用視為一種取捨、判斷後的行為，並關注說者如何、及為何引用。例如引用孔子之言佐證說者自己的意見、引用孔子之言以代替說者評論、或者引用孔子之言並加以批評等等，這些不同的做法本身實即內含說者對於孔子的不同意見，而不必關乎所引述的內容是否為孔子本人所說。這種取徑的侷限是將略於指出說者是否承襲或改造孔子的真實言論。不過，在「言公」以及思想會通的時代風氣下，所謂的承襲或改造其實本就不容易釐清，相關考辨甚至因而易於滲入研究者自身所認定的孔子形象與地位。因此換一個角度來說，這種做法的長處便是可以不必割捨引述之舉所提示的孔子論述線索，卻又能夠在進行大範圍的討論時，更加聚焦於說者意見，不必橫生枝節。

其次，本書討論的時間範圍，始自春秋戰國，斷至西漢晚期（昭、宣、元、成年間），並統名為「周秦漢之際」，俾使更有效地聚焦西漢尊孔論述的前後脈絡，以及孔子論述在易代轉型之際的發展。西漢一代，一般分為高、文、景之前期，武之中期，昭、宣、元、成之晚期，乃至哀、平之末期，所面對的政治情勢等問題各有不同。之於孔子論述，西漢中期及西漢末期是兩大重點。前者有董仲舒集大成的尊孔

論述，自此提引出孔子在政治場域中的特殊意義。後者則既有以孔子為感生聖王的讖緯之說日興，又有尊周公的王莽竄起。至於西漢晚期，則是銜接前後兩個時期，既為西漢中期的後韻，也發西漢末期的先聲。本書基於前者而下探西漢晚期，至於其為先聲的一面、乃至西漢末期的新發展，將俟後另論。

由此，本書所論涵蓋戰國至西漢晚期相關的典籍文獻。處理上則區分為以下三層：整體性、一般性的觀察（所謂當時普遍意見、一般共識等），乃綜合觀照戰國至西漢晚期的傳世與新出文獻。⁷⁰進則，選定重要典籍或思想家派為基本座標，包括：戰國時代的《墨子》、《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及西漢時代的陸賈《新語》、賈誼《新書》、《韓詩外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及《賢良對策》、劉向《新序》及《說苑》、小戴《禮記》。⁷¹至於敘

⁷⁰ 新出文獻中的孔子故事有：郭店簡《窮達以時》、上博二《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上博三《中弓》、上博四《相邦之道》、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君子為禮》、《弟子問》、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上博八《顏淵問於孔子》、上博九《史蒧問於夫子》。又，上博八《子道餓》，整理者原認定為陳蔡故事，但後來研究者一般不作此解，故暫排除。

⁷¹ 此處需補充說明者為，基於廓清本書論述脈絡的考量，《淮南子》與《大戴禮記》雖具重要性，卻只提供整體觀照基礎，未列為討論座標。《淮南子》黃老道家視角的孔子論述值得注意，但是該書在歷史或學術史上皆與西漢官方有一定程度的相對性，因此有必要與儒家的尊孔論述脈絡區別，俟後另作考察。至於《大戴禮記》，雖然成書時間與小戴《禮記》相近，且亦收有許多孔子故事，但是相較之下，小戴《禮記》較適宜觀察尊孔論述的後續發展。至於小戴《禮記》較適

史類文獻——包括《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以及較近於實錄的《論語》——，則隨文釋義，即視各段文字內容，決定應視為史料（如《左傳》之記孔子卒），或用以觀察作者的孔子論述（如《史記·孔子世家》），抑或視為對某位人物之孔子論述的記錄（如《漢書》所錄之董仲舒〈進賢良對策〉）。

並需說明上述安排中的兩點考慮：一是，本書對文獻時代的判定，著眼該文獻對於某一時代之孔子論述的代表性，而非著錄時間。因此，雖然《韓詩外傳》、《新序》、《說苑》、《禮記》等書所收錄的孔子故事多有傳自戰國時代者，但是本書仍將這幾部典籍置於西漢時代討論。因為，編者選錄大量孔子故事編成該書，是西漢時代的事件。其取捨、著錄的行動本身，實即一種當下原創的孔子論述。

再者，本書選定討論座標，是為了便於對照既有的思想史脈絡，並在此基礎上梳理出孔子論述的發展脈絡。這使得本書將顯得略於照顧戰國文獻本以篇行的特性，以及近年備受討論的新出文獻。所謂戰國文獻本以篇行，是前輩學者早已指出的基本認知。近年且有部分學者據此反省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家派框架，認為簡化了戰國學術的複雜發展。

⁷² 只是此說縱為深識，卻尚不適用目前的戰國孔子論述研

宜的原因，詳見本書第五章第二節針對該書所作的討論。

⁷² 相關的討論情況，可參見柯馬丁的簡述。柯馬丁（Martin Kern）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151-152。不過，戰國晚期本有思想交融的情況，司馬談說屬於學術史上的分類，不必泥為後世門牆各別的學派概念。

究。因為前述反省其實也奠基於既有的學術史框架，只是修正、商榷其中邊界。而戰國孔子論述卻仍待建立框架，梳理紛然多元的表面樣態。就此而言，戰國孔子論述的研究，目前仍不能脫離提供定位與意義脈絡的學術史座標。至於以篇單行、且呈現戰國混融學風的新出文獻，既然不宜統括地「自成一家」，與其他既有家派並立，遂亦不免隱於本書的整體性觀察中，未能個別顯題。此為取徑上的限制。為衡偏隅，本書並不預設同部典籍之不同篇章必出一人之手，且留意指出一部典籍中有不同意見的情形。而個別新出文獻若有針對特定孔子論述議題的特殊觀點（如〈窮達以時〉之於孔子困窮），本書也將在正文或附註中指出，以備讀者參考。

二、研究方法

為因應各時期孔子論述的特性，本書具體研究取徑將於各章簡述。以下則針對本書整體所採取的視角，作方法論的說明。

本書的研究視角，主要借鏡於劍橋學派所主張的語境主義（contextualism）方法論。⁷³ 簡要地說，語境主義方法論

⁷³ 語境主義之方法論，可參見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俱收入丁耘編：《什麼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95-135、136-165；昆廷·斯金納著，孔新峰、康子興譯：〈文化詞典之觀念〉，收入許紀霖編：《啓蒙的遺產與反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 108-124；並可參見昆丁·史金納著，蕭高彥編：《政治價值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楊貞德：〈從論述看歷史——波卡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轉向自我——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個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張將言說視為一種出於說者特定意圖，並回應其所處之特定時空（語境）的行動；因此，在理解某種言說（如文本）時，便應該掌握說者希望自己的言說如何被其語境及聽者所理解。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或譯斯金納）〈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云：

理解文本的前提在於掌握文本試圖傳達的意涵，以及希望這一意涵怎樣被理解。爲了解一個文本，我們至少必須理解考察對象的意圖，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意欲的溝通行動（intended act of communication）。這樣，我們在研究這些文本時所要面對的問題在於：這些文本的作者身處特定的時代，面對特定的讀者群，他們通過自己的言論實際要傳達甚麼。⁷⁴

而所謂「特定的時代」對於文本及理解文本的重要性在於：

任何言說必然是特定時刻特定意圖的反映，它旨在回應特定的問題，是特定語境下的產物，任何試圖超越這種語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⁷⁵

這兩段文字清楚指涉本章初始所謂「孔子論述研究」的兩個重點：關注說者的意圖為何，以及在語境中看言說的意義。史金納等人提出此說的重要目的，即反思是否真存在一種無視說者意圖與時空環境，而能夠恆久地維持相同意義的哲學

2009），頁 49-82。

⁷⁴ 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頁 132。

⁷⁵ 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頁 133。

關鍵詞。此一反思所蘊含的觀點與孔子論述研究的起點正可相應——是否真存在一位意義恆定的孔子？抑或，孔子會在不同時代、不同意圖的說者口中，展現不同的樣貌與意義？就此而言，語境主義雖然與孔子論述研究的文化背景脈絡相異，但在旨趣相通的提問與著重下，語境主義方法論其實相當適合作為孔子論述研究的基本視角。

由此，本書借鏡語境主義方法論之處，主要為其所提出的兩個視角：其一，即理解文本時，著重於說者「試圖傳達的意涵，以及希望這一意涵如何被理解」。採取此一視角的原因並不在於要使「作者復活」，而是為了對應孔子論述這一研究對象本身的性質。因為，任何所謂呈現某人形象與地位的言說，在意義上都要求說者思考「如何被人理解」，甚至是「如何被多數人理解」。一套不被人理解、接納的形象、地位論述，無論說者以多麼複雜精密的論證加以建構，都沒有達成其論述目的。換言之，孔子論述的言說本質，就是試圖傳達某種說者希望被人理解的意涵。語境主義的關注，因而適足以探問孔子論述的言說。至於如何探問？如史金納所言，線索即在說者所身處的時代及所面對的聽（讀）者。舉例來說，同樣是宣揚財富之危險的言論，說者在富裕抑或貧困的時空、面對的是苦行僧抑或清教徒，這些脈絡性線索會呈顯出說者在言說當下的特定意圖。本書以下的討論因而將會格外注意下列問題：說者意見與當時一般共識的比較、說者意見對其所處時空之重大問題的回應、以及說者針對其他論說的回應與往來；並進一步透過這些問題，思考論述者希望在其所處時空、對其所面向之人物，塑造出

甚麼樣的「孔子」，其論述又具有何種欲施加於該時空與聽者的意圖。⁷⁶

其二，本書將「孔子論述」的性質，界定為一種「特定語境中的言說行動」，因為：

任何認真的言說者在言說 (saying something) 的同時也在行事 (doing something)，行事是透過言說實現的。⁷⁷

此界定可以建立孔子論述中說者意見（思想）、言說行動與歷史脈絡（語境）的連結，亦即前後二者得以互動的中介。藉此，本書一則將向為重要參照的歷史背景，確立為孔子論述內在（因其性質所需）的外部因素，二則著重抉發孔子論述於其所處時空的行為（行動）意義，由此推進、開顯周秦漢孔子論述的意義面向。進則，本書亦因此留意於此言說行動中的互動情況——不只是論述者與其時空，且及於論述或論述者之間。之於周秦漢思想，探討論述互動的嘗試別具重要性。近年研究已多言及戰國思想走向會通融合並下啟漢代思想的發展，一般卻仍傾向點狀思考戰國諸家學說，並在論述中分立地呈現；前述孔子形象研究的現況便是如此。但是，各種同題異旨的類型化孔子故事，提示著一條思考的線索：即，所謂戰國學者的互動，未必得要侷限為人物相會或

⁷⁶ 一體兩面地，這種做法將較為略於關注孔子論述對於說者自身思想體系的意義與作用。不過該視角已見於近年分析個別典籍之孔子形象的豐富論著，且既有成果亦內在於本書的討論之中。

⁷⁷ 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頁 140。

相與問學，說者藉由變異語境中已有的孔子故事，表達自己與原版本不同的意見，同樣也是一種回應的行動。孔子論述由此遂得跨越學說脈絡的隔閡，呈顯為共同的言說行動主題。在孔子論述的脈絡中看諸子異說，而非在諸子各自的脈絡中看其孔子論述。

不過，需附帶說明一個本書與語境主義方法論略有不同的觀點。語境主義作為一種關注歷史文本的方法論，其所謂的「語境」實即「歷史語境」，並且由於（線性時間觀之）歷史時空當下即逝的特性，語境主義學者根本地質疑「超越語境」的觀念。而本書以下所謂的「語境」一般亦仍指歷史語境，不過，並不排除孔子論述之議題或「孔子」之意義的部分脈絡跨越語境的可能性。因為就孔子論述來說，其相關的言說將可能藉由文本的載述而自成一種「經典內部的語境」。這種語境將因為由當時人們的意見所組成而具有時空性，也因為載於文本而可能在歷史中傳承，與不同時空的說者分享其意義。特別是西漢中期以降，五經成為權威文本之後，依附於經解的孔子論述或將更加具有跨語境的力量。由於是孔子論述本身的特性，本書因而需對語境主義方法論中無法超越語境的觀點有所保留。

三、章節架構

本書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為四章。依序為：

第二章 戰國孔子論述的形成——並論孔子論述研究的基本面向

第三章 「孔子」的身分——戰國孔子論述中的學政關

係問題

第四章 尊「孔」的意義——秦至西漢中期的孔子論述
重構

第五章 皇權的回音——西漢中晚期孔子論述的道、政
調處

這四章在時間上可分為相接續的兩部分。第二、三章探討戰國時代的孔子論述，第四、五章則循前章脈絡探討秦至西漢晚期的孔子論述。（第四章聚焦秦至西漢中期，第五章論西漢中、晚期。）冀以整體呈現孔子論述在周秦漢之間發展的變化與延續。

內容上，第二章別於其後三章，總論戰國孔子論述全景；以其為基礎的「『孔子』的身分」、「尊『孔』的意義」及「皇權的回音」三章，則延伸所見線索，聚焦本書論題，分別探討周秦漢之際針對「孔子之政治身分」的論議緣起、論述建構、及後續調整。

此外，本書並以第二章的討論作為例示，嘗試建立一種孔子論述的研究進路。如第二章的節副標題——「符號意義的衍生」、「概念交涉與議題形成」、「詮釋活動性質的呈顯」——所示，此一進路可以分為三部分：其一，藉由歸納說者所預設的「孔子片面」（主要的關注面向），探討「孔子」一名在其所處語境中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其二，分析說者在論述時援以與「孔子」一名作意義連結的概念（如戰國之「聖」、西漢中期之「天」），藉此探討說者在其言說行動中所關切的議題，以及所表達的意見；其三，探討孔子論述在其所處語境中作為一種言說行動的特質，進而思考「孔子

論述」對其所處語境的作用與意義。第四、五章的討論基本亦循此進路，惟為了因應西漢語境的不同樣貌，增強了對於時空背景的梳理。此一進路對於各種不同時空之孔子論述的適用性仍有待拓展，冀能藉此開啟更多討論，使各種不同的孔子論述能在系統性的討論中分別呈顯、亦能互相比對。